

## 滕藤同志在国家科委二三事

○ 齐 让 (1973 级化工)

滕藤同志是1984年12月调到国家科委的。他来时面临的是“三新”：新形势，刚刚召开了全国科技大会，1985年3月中央又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新班子，国家科委重组领导班子：1984年9月，宋健被任命为国家科委党组书记、主任，1985年1月，滕藤任国家科委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任，几位副主任也是新人；新职务，大学的领导任部委的二把手。

当时正好赶上一个改革的高峰，全国各个领域都在改革。科技领域更是要走在前面。老制度需要改革，新制度需要建立，人才是短板，如何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更是迫在眉睫。滕藤同志分管的司局比较多，有科干局、综合局、外事局、情报局（办公厅和人事局），作为常务，所有的事情要过问，要有决策意见。我们几位领导秘书都知道，就他的文件、会议最多。

先说建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这件事是李政道先生提出的建议，他给邓小平同志写信，觉得我们现在培养人的渠道还是少了，特别是高层次科技人才。小平同志非常重视这项人才培养工作，就把这个任务批给国家科委落实，滕藤同志分管的科技干部局具体落实这项工作。那一年科干局有两件大事，一个是职称改革，还有就是建立博士后流动站。建立博士后流动站制度，上面还有不同的看法，还需要做工作。制度如何建立？经费从哪里来？都是难题。没钱肯定是寸

步难行。那个年代国家也穷，刚搞改革开放，都需要经费。我陪滕藤同志去了财政部主管田副部长的办公室，面积不大、非常简朴，而且是两人一间。滕藤同志说明来意，先解释什么叫博士后。硕士是导师定题目，导师带着学生一起研究；博士是老师出题目，主要是学生自己研究；取得博士学位后，继续从事研究工作，需要一个科研环境和条件，就是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博士进站后，大概是两年、三年出站去正式工作。我们国家科研和经济建设急需人才，特别是高层的人才更少，很需要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培养人才的经验和做法，建立这个培养人才制度。田副部长听后，同意资助试点经费。经过不懈努力，1985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我国开始试办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试行博士后研究制度。最开始是选中科院的研究所等单位试点，有中科院理论物理所，在试点基础上进行总结再来形成制度。组织机构上，顶



2009年，在青海参加盐湖化工与循环经济专题研讨报告会。左起：费维扬、高云龙、滕藤、朱兵

## □ 怀念师友

层有个管委会，管委会主任就是滕藤同志。然后还有一些成员单位，教育部、人事部等相关的部委，办公室设在国家科委科技干部局。这个制度的建立，在当年是挺新的一件事。记得很清楚，制度推出来后，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里有报道，当时的播音员读成了“博士/后流动站”，把断句读错了，就知道这制度确实挺新。博士后的待遇也不错，听他们讲，进站就能够补200块钱，那时候工资一档才6元。博士后还能解决夫妻两地分居和配偶的北京户口，可以说待遇非常优厚了。多年后，我和欧阳钟灿院士聊起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他说自己就是第一个享受博士后制度政策的。欧阳钟灿从清华拿到博士学位后进入中科院理论物理所博士后流动站，出站后留所工作，后来当了所长，1997年被评为中科院院士，应该是国内博士后里最早评上院士的。当年建立了102个科研流动站，有250多名博士后进站。近年来，我国博士后每年进站人数都超过2.5万，其中80%集中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办和国办刚刚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和使用的若干措施》提出，要完善自然科学领域博士后培养机制。从质量、数量、管理等方面提出了要求，强化产学研融合，在创新实践中培育青年科技人才。

第二件事儿就说说职称制度改革，这更是一件大事。滕藤同志在任期间主管职称制度改革。因为职称改革涉及的问题更复杂，和每个科技人员息息相关，也涉及到分配制度、财政经费等问题，所以组织架构更高，由中央负责。中央过去有一个职称评审小组，撤了之后改成职称改革领导小组，组长是宋健，副组长全是部级领

导同志，中央是书记处和国务院分管。滕藤同志任领导小组副组长兼职称办公室主任。职称改革涉及面广、难度大。我国的职称制度在“文革”期间停了，1977年、1978年恢复，到了1983年又停了，因为搞乱了。主要原因一是数量的控制，二是过去职称和工资不挂钩，就是称号，但是这一次职称改革的核心要改成技术职务，既和工资挂钩，又要改为聘任聘用，这就复杂了。当时这个制度的设计，还有序列，最大的难点是要和工资挂钩。职称制度改革时全国有职称的大约595万，高级职称占比1.7%，不到2万人，中级30%多，其余是初级职称。已有的职称能不能全部进到技术职务，其中可能有人能进，有人进不去，要评聘分开。因为这个事情影响很大，各种调研、座谈会也多，这件事花费了滕藤同志很大的精力。因为做他的秘书，我经常能看见他用“红机电话”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情况、请示问题，解难题，化矛盾。终于在1986年初，召开了全国职称大会，确定了新的职称制度。

第三件事就是国家核安全局的成立。1984年10月，国家核安全局经国务院批准成立，同时还成立一个国家核安全中心，负责具体的业务。国家核安全局既是国家科委的一个内设局，又相对独立，因为前面带了“国家”两字，还有国徽印章。滕藤同志在两个机构的职能具体化、调干部谈话、和宋健同志沟通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最终经党组批准组建了两个机构的新班子。这件事反映了滕藤同志的战略前瞻性，因为当时国内的民用核工业还没什么东西，他从国家的安全考虑，以一名核化工专家的视野认识到其重要性。两个机构的成立和组建队伍，填补

了国家的空白，对我国核事业的发展和核能安全利用奠定了良好基础。

滕藤同志还分管综合局，为落实推进国务院科技体制改革有关决定的要求，他不辞辛劳地奔波在全国各地。滕藤同志对科技体制改革的意义、目的、任务和措施都有独到见解。分管干部管理学院，办第一期高级研究班，他和国家科委的领导都来讲过课，他的演讲深受同学们的欢迎和喜爱。他当时还分管国际合作局，我们国家第一个国际合作双边科技协定是1978年和法国签的。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双边科技协定也签订得越来越多。我陪滕藤同志去德国访问过一次，他外语也好，是那种既有原则又思想开放的人。我们一行人在德国从南到北，参观了不少研究机构，还特意去了人家的废弃盐矿参观。后来我知道，是因为那时候核废料没办法处理只有深埋，德国就埋到那个盐矿里。滕藤同志到哪儿都还想着自己业务的问题。还有几个国家计划的实施，比如“星火计划”面对的就是农村的乡镇企

业、小企业。当时正好是我们国家排球的鼎盛时期，排球的战术有“短平快”，“星火计划”也借助这个术语，周期要短，搞实用技术，速度还要快。宋健同志有次在会上说，幸亏滕藤给我们这几个计划起了好名字，一个是“星火”一个是“火炬”。1988年出台的“火炬计划”面对的是高新技术产业化。

滕藤同志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在国家科委工作一年多，虽然时间不长，但干的都是开创性工作。后来和他聊天，他说没有干什么，说自己是大学教授，没有当过那种官，压根就不知道讲什么排场。刚来时，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在一个楼办公，办公室紧张。我和他不在一个楼层，工作不太方便，他就说不要麻烦别人腾房子了，你就搬个桌子坐我这屋。我说秘书没这样的，他说管别人干嘛，咱们就这样，当然后来我坚决没搬。还有一次我陪他出差，由于房间紧张我和他住一间房。他不让我拼沙发睡，说对腰不好，执意让我和他一起睡在大床上。滕藤同志就是这样，在生活中他就像父辈一样关爱下属。

1986年3月，滕藤同志调中宣部，后调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教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人大任职。他是心系家国的科学家，大家公认的“跨界专家”，就科技而言他是战略科学家。他的音容笑貌经常浮现在我眼前，他对党对国家的忠诚、对事业对工作的求真务实的精神，激励着一代一代清华人，去拼搏攀登。



2002年，滕藤（前排右3）参加美国气候变化政策与京都议定书前景座谈会